

譚仔姨姨鄉音 傳承香港獨特精神

許楨 資深評論員

事實上，譚仔的成功，就好比香港的成功。出身於第一代外省移民家庭，將西南麻、酸、香、辣的口味引進本地；在嚴控成本之餘，經現代化改良後，建成立體系的品質保證和店面管理，最終得到國際投資者垂青。譚仔及其鄉音姨姨，是香港的、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沒有界限，就是香港的界限；沒有「他者」，就是香港精神的「金身」。

近期，有幾宗驟眼看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新聞，筆者卻願意順手拈來，並列在旁一起解讀，既作為對眼前「我城」處境的戲謔、解嘲，也是對「我城」內在精神的點點感悟與憐惜。今天，誰是、誰又不是香港人？穿越政爭的迷霧，我們依稀記得西西筆下的《我城》嗎？忘卻我們從哪裡來，斷然無法把握往何處去。失去靈魂的城市，留下古樓也徒具空殼。而除卻多元與包容，香港的靈魂，還有別注嗎？

這幾宗熱話，包括特首主張委託房協作「郊野公園邊陲」建屋的可行性研究；市建局決定整棟保育港英管治之初營建的唐樓；無線播出新版《射鵰》；以及有日本飲食集團全面收購譚仔雲南米線，據信作價達10億元之巨。

兩地人員長來短往乃常態

筆者主要從普遍性、指標作用，以及效費比有限三方面考慮，相信郊野公園邊陲建屋或長者宿舍，主要面對並非是否適當、可行的問題，而是成本效益的挑戰。當年劃定郊野公園範圍，

固然沒有全面而科學的環境普查與研究，然而，基本根據等高線和山勢劃出的保留範圍，可以建屋的地理、運輸條件，恐怕不會太充分。因此，即便找到一兩處合宜地點、以作探究，得以推而廣之的幾率也有限。

即便如此，也想不到煞停前期研究的理由，是否由房協承擔此重任，應否知會行將就任的新特首，也是行政層面的問題。恰於其時，坊間部分政界及環保人士，就以先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為由，認為「犧牲」郊野土地、多建公屋不一定可取，其潛台詞實為：「新來港人士」乃是導致公營房屋不足的主因，又祭起「源頭減人」的大旗。筆者聞之心乃戚戚，此論已非政策討論，而是牽涉到對「不同」族群的公然歧視與排斥。

無論在政界還是社運界耕耘，總不同以權為經、以變為常。內地與香港兩地人員來往實施嚴格管制，只發生在朝鮮戰爭白熱化之後，到文革結束之前。從港英政府成立至今逾一個半世紀以來，無論港英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視兩地人員的長來短往為常態。無論我們是否

承認1997年7月1日之前港英政府的合法性，在人員來往的實際操作，香港從來被視為中國之一部分無疑。

從「單程證」到「通行證」制度的施行，其實是考慮到百餘年間兩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生活習慣落差，以及香港開發空間小、承受力弱的客觀狀況，進而作出的行政措施。若嚴格遵循領土、憲政與人權原則，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行政當局都不宜禁止中國公民在香港進出、停留，甚至長住。

戰後初期的人口普查，顯示香港居民逾8成出自第一代移民家庭，大半世紀前的原居民和港英政府，又有要求過什麼入境審批權呢？假如入境審批權操之於港府，又根據什麼法源，針對內地來港依親者而設限？難道今天的特區政府，有為港人之外籍配偶、子女來港團聚而設定限額？若如是，為何近年來，歐、美、日、韓外籍在港家庭的增速，竟高於本地人口？與此同時，單程證的平均批出量，只及限額三分之一？

「廣府話」非香港「母語」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宋、元之際南下、來自東莞者，亦即「圍頭人」，還是明末清初抵港、來自粵東者，其「本土」方言，都不是「廣府話」。前者說「圍頭話」，後者母語是「客家話」。方言之下再分「片」，「東莞話」/「圍頭話」與「廣府話」同屬廣義廣東方言，但並不同「片」。而「客家話」是獨立且流傳最廣的跨省方言。筆者傾

向於認為自己的母語，也是廣東方言之一種，只是發音較特別的一「片」。

無論如何，香港的「本土」語言，「圍頭話」也好，「客家話」也罷，均不視為「廣府話」。在語言學上，這三種方言的流播是平行的，並無任何從屬關係，越是強調「廣府話」在香港的通用，越反映香港之本質就是移民城市。世代以來，起碼自清代以來，來港人士就出自五湖四海，因而我們強調的是「通用語」，而非「母語」。

若港人將「廣府話」、「廣東文化」圖騰化，其實是反智而明顯有違香港發展歷程的歪理。已融入我們骨髓的港式生活文化及語言習性，除「廣府」外，同時受到上海、京津、歐美、日韓、東南亞、南亞因素的深刻影響。筆者少時一覺醒來，外公帶我到洋興茶餐廳飲錫蘭紅茶、食出前一丁，再到鄰街的揚子理髮店剪髮，中午餓了在已結業的馬達餐廳來個馬來咖喱。我們會懷疑這是典型土生港人的日常生活嗎？

近日無線播出港人導演、內地製作的《射鵰英雄傳》。別說「廣府話」，金庸先生連普通話都難稱流利，遑論標準，難道這位來自江浙的華人世界通俗文學泰斗，港人口中的「上海佬」，不是地地道道的港人？而創立無線電視的邵逸夫先生，也是原籍寧波的新加坡人，又何曾講得一口流利「廣府話」？若金、邵二老都

不算港人，又有誰算呢？

香港勝在包容與和而不同

關於口音，日本集團收購譚仔消息一傳開，該店「大媽」服務員的「鄉音」，就成為網上另一道「風景」。筆者與內子在倫敦求學、生活，從校園到圖書館、檔案室，時光荏苒、往來倏忽，數年下來還真弄不懂什麼叫「倫敦音」？何為「英式英語」？從英國到香港，其地雖小，然其包容與龐雜，即為其偉大處。

包括梁天琦在內，又有幾位港人母親或祖母，不是鄉音未改鬢毛衰的移民女性？不是胼手胝足、辛勞持家者？這難道不是港人母親最貼地的寫照？《富貴逼人》中的沈殿霞，不也是滿口「鄉音」的「上海婆」嗎？其潑辣果敢，不獨讓人忍俊不禁，也反映數十甚至上百年來，和而不同，就是香港的「東西南北和」。



譚仔的成功說明了包容開放才是應有之義。

香港絕不比外國差

錢志庸 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筆者今年年初到了英國、法國和荷蘭公幹。許多歐洲國家在不少香港人心目中是生活悠閒、生活質素高，人民也和善優雅的好地方。筆者曾經在許多文章中指出，其實在外國生活，未必如許多香港人想像中美好，這個想法在這趟行程中得到了更深入的印證。

歐洲國家並非特別「超然」，同樣也存在着各樣社會問題，例如：階級觀念、歧視等。筆者留意到，不論在英國、法國還是荷蘭，在當地普遍被認為是屬於需要較低技術的工作，例如的士司機、清潔工人、非高價餐廳的侍應生等，絕大部分都是由「有色人種」擔任。

筆者在途中特意與這群人交談，了解他們在這些國家的生活和想法。一名居於法國已有15年的埃及籍的士司機，在居住法國前在加拿大工作時認識了現時法國籍的妻子。兩人雖然不是加拿大人，但在加拿大都能得到友善和親切的待遇。後來這司機隨妻子到法國定

居，好讓妻子能與家人團聚。但他在法國生活的感覺卻與加拿大截然不同。他向筆者傾訴，法國人對待他如外人，被他們以有色眼鏡看待，無法建立對法國的歸屬感。筆者回想起約30多年前在加拿大生活的日子。加拿大在獨特的歷史背景影響下，那時的確已是一個接受多元化種族的國家。加拿大的社會繁榮、經濟發展良好、人民富裕，加上良好的教育，在生活質素、社會氣氛和發展等方面，領先許多歐洲國家30多年。

世界各地人將渴望來中國發展

筆者又與一名在法國當的士司機的剛果人，和一名在荷蘭留學的尼泊爾女大學生交談。他們都是離鄉別井，到心目中比他們本國強盛的國家工作和留學，期望得到更好的發展機會。就如早期的香港，很多香港人都選擇到認為地位較「高尚」的國家求學，希望有更好的教育和發展。不過，來自「弱國」的貧窮留學生離鄉別井，很多都一邊讀書，一邊做兼職工作，生活本是辛苦，加上文化不同，又不能享有當地的公民權利，其實生活絕不好

過。但說起來也奇怪，行程中幾乎沒有遇見中國人。筆者曾問過當地人對中國人的評價，他們都大讚中國人是好市民，不會搞亂社會。既然中國人受當地人所接納，為何反而甚少看到中國人在當地工作？或者他們都聚集在唐人街，或者他們都創業當老闆，以致筆者在街上看不見，但原因實在難以猜想。無論如何，一個人如果在自己的國家感滿足，誰又願意去別國生活？但現實殘酷，很多離鄉別井的人向筆者表示無奈：「為了生活，我們沒有選擇」。

只有國家的國力微弱，人民才會渴望到別國生活。不過香港自回歸以來發展迅速，加上中國國力日漸強盛，教育、經濟和競爭力都達到甚高的水平。現時已有外國人到中國求學或尋找事業發展機會。相信終有一天，中國人再不需要去別國謀生，而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渴望來中國發展。不過現時香港社會上有些人卻故意逆行逆施，總是在搗亂香港。香港不比外國差，難道他們以為搗亂了香港後，重新建立一個繁榮社會是一件容易的事嗎？香港人應該為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繁盛而感到驕傲。

人對人促銷電話應有一定豁免

黃定光 立法會議員



由真人撥出的促銷電話令人煩厭，無論是上班、開會、吃飯，以至休息，每當電話鈴聲響起看到不熟悉的電話號碼都令人猶豫應否接聽，因為不想聽到來自財務公司和美容公司之類的推銷電話，浪費時間和金錢，但又擔心沒接聽會錯過重要的事情。

特區政府在2007年訂立《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規管濫發電子訊息及錄音電話傳銷以來，雖然有關資訊已告消失，但市民卻未因此而得到寧靜，事實上，人對人的電話促銷活躍依然，最近當局就改善有關問題發表諮詢文件提出三個方案。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最近就規管促銷電話發表公眾諮詢文件，當中提出三個方案，並且不限於只採取一個，可推行多於一項。該三個方案包括：1.改善人對人促銷電話業界的自行規管；2.推廣智能電話的來電過濾應用程式；3.立法設「拒收訊息登記冊」。

此前，政府於2015年委託獨立顧問研究發現，96%受訪者認為人對人促銷電話帶來滋擾，亦有86%人士支持擴大規管，並且有67%人士支持立法才有效。因此筆者相信，坊間對此已有清晰看法，就是必須作出應有的監管，至於具體如何進行則可詳細研究。

談到要如何監管、完善電話速銷的問題，筆者始終認為當年制訂《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時，由自己提出的修訂案是最佳方案。該修訂案旨在局限豁免的範圍，只有依據致電者與收訊人的過去或現行業務或客戶關係而打出的人對人促銷電話才可豁免；至於

並非依據致電與收訊人之間的這類關係，必須符合條例草案相關所訂的規定。除此之外，當局或可同時考慮所有非應邀的推銷電話均不可透過任何設備以隨機方式打出，以及所撥出的電話亦必須要有來電顯示。

多管齊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還有其他意見，包括三個方案中，業界自行監管的意義並不大，而手機過濾應用程式應由政府免費提供，配合立法設立拒收訊息登記冊，多管齊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也有提出規定所有非應邀推銷電話資料都應由同一電話字頭號碼撥出，方便市民識認所屬來電。

從另一方面而言，非應邀促銷電話非絕對十惡不赦，市民還是可以從中得到最新和需要的資訊與服務。舉例如推銷電訊服務，有時電訊公司會推廣一些特價手提電話通信服務，提供的優惠相當吸引，這些對市民而言並非壞事。我期望規管能在影響市民生活和業界運作之間取得平衡，同時在法制訂時必須是實際可行的，能夠實行的，否則法例形同虛設。

是次諮詢為期約兩個半月至7月底止。當局強調沒有既定立場，結果會視乎諮詢結果而定，但令人關注的是當局沒有詳細交代諮詢完結之後的任何進一步工作，加上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在諮詢期結束時正是新一屆政府剛上場之時，我們必須監察政府當局有關工作是否能得以順利交接延續，將諮詢工作做好，確切制訂適合政策，改善困擾市民多時的促銷電話問題，而不會不了了之。

張德江委員長視察澳門的深意

楊云

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到澳門視察。3天的行程中，張委員長大讚澳門就第23條立法，國民教育成功，又提醒澳門立法會有關「拉布」、「議會暴力」等問題。這些話，在一些香港人聽來，自然感到話中有話。於是，有意見認為張委員長是在向香港施壓，要將澳門的「成功經驗」用於香港。這些猜測是否準確，筆者不敢妄斷。張委員長在行程中既然沒有明言，我們亦不便想得太多。否則，過分主觀的解讀只會令大家忽視了這次行程中一些客觀而重要的訊息，放錯焦點。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張委員長此行的目的。這次澳門之行與過去最顯著的差別在於「時間」，既非節慶，亦無重要活動，只是三天的平日，可見目的有所不同。張委員長開宗明義地說明，這次是受國家主席習近平委派視察澳門。所以，這次視察，不是以往受邀到訪，而是主動的職權。張委員長是分管港澳事務的最高級中央官員，他在抵達澳門時，就提到「在中央我分管港澳工作，我每天都關注着澳門的發展和變化」。這次行程的工作性質，亦彰顯了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上下級關係。

大家應該還記得中央2014年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到一個有關「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概念，就是「全面管治權」。在中央眼中，「全面管治權」不能只是一種說法，而是要切實地實踐，這種視察即是一例。套用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的說法，就是中央要在特區加強「主權能見度」，讓特區「看到」主權在中央之手的事實。因此，大家可以預期，這種視察未來亦會在香港出現，而且會規範化。

勿只以自己視野看張德江講話

接下來，談談大家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張委員長對澳門的嘉許，是否暗藏對香港的批評。首先，我們要知道香港與澳門的客觀差異。在體制上，兩個特區雖然同是「一國兩制」，但雙方的「兩制」並非完全相同。單論《基本法》下所說的「行政主導」，在澳門的《基本法》中，特首被賦予職能有18項，而對岸的香港，特首的職能只有13項。同是「行政主導」，但在操作層面，兩者的機制與效力大相徑庭。這只是制度的表面差異，還未論及港澳兩地在政治、社會、經濟的深層差異。這些差異，作為深諳港澳事務的委員長，難道會不清楚？

若從上文分析，張委員長對澳門說的話，重點也只是對澳門的嘉許。張委員長在行程開展時，就用了3個詞語概括：「感受、考察、鼓勵」。這些嘉許的說話就是「鼓勵」。為何要「鼓勵」？因為中央對澳門的要求提高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香港的朋友對大灣區自然關心，但不要忘記，這句話也是對澳門說的。中央寄望澳門未來在大灣區中有所擔當，自然亦希望澳門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有更好的發展，故此對澳門過去有關「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亦有必要給予充分的肯定。

說到底，在中央眼中，對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區始終一視同仁，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典範。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反而應該為張委員長對澳門的嘉許感到高興，因為發展好的澳門對同屬大灣區的香港是利多於弊。可惜，若果我們仍只是以自己的視野去看，執著於港澳兩城的高下比較，可能會忽略了張委員長的深意。

香港青年創業由零到一的最實際考慮

黎達成 香港青賢智匯創會副主席 創新及創業委員會召集人

說起青年創業的發展，筆者留意到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近來發放了一批資助予9間機構，推行不同類型的青年創業計劃，大部分計劃都以30萬元的創業資金作宣傳，亮麗的宣傳海報相信成功吸引了不少有志創業的青年的眼球，此舉確實有助發掘具潛質的創業項目，並協助他們走入商業市場。從種種調查數據中不難看出，青年創業的成功率極低，總數僅僅只佔到了青年創業者的約3%。筆者在此勸喻青年不要盲目啟動，事實上，失敗的例子遠比成功的更多，往往我們並沒有機會聽到他們的失敗故事而已。在此，筆者建議港青在啟動創業計劃前有三方面的考慮點。

第一，青年創業不但注重團隊合作，在知識型社會上，技能互補也同為需要。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曾說：「團隊合作是企業成功的保證，不重視團隊合作的企業是無法取得成功的。」建設一支有凝聚力的團隊，已是現代創業型企業生存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團隊是具有思考性、主動性和協作性的，它不是人力的簡單相加，在合作中，團隊要能夠做到1+1大於2的效果，

就是我們常說的「化學反應」。創業不僅僅是一個人戰鬥，青年創業者要學會凝聚起整個團隊的力量。反過來講，一個能讓創業者思想、能力、認識水平不斷提高和善於學習借鑒的團隊，才是創業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自認具創業條件應馬上付之實現

此外，訂立創業的目標和原因是驅動成功的重要因素。筆者認為如果創業只為求盈利，缺乏關愛社會的態度，也未能稱得上是一位成功的青年創業家。如果創業者能在構思項目時多考慮社會或顧客的需要，分析市場痛點，再作項目的內容設計及開發，筆者相信絕對有助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在社企的例子中，香港有一線通平安鐘及黑暗對話。創業者也可以考慮指定社會效益目標，例如辦教育的在經營時可否安排閒置的資源予基層小朋友，開發網頁時有否考慮成為無障礙網頁讓所有人都能閱讀。微小的企業行為讓社會變得更好，更能建立良好的商業形象，因此創業者應給自己一個能結合社會關愛的商業機會。

第三是思考。許多創業者很多時

是叛逆或有不滿的心態而踏上這條不歸路，但筆者發現很多成功的創業者都是擁有家人的支持，在資源和精神上無限量協助。即使家人不願接受你的創業行動，但也不至於抨擊或是阻擾。可悲的是商業世界，創業道路上有太多不如意的事情，創辦家每天可能要面對不同的機遇，若背負着家人的阻礙，那勢必會讓情況複雜許多。因此，筆者建議應執行「先安內、後攘外」的策略，先默默地做出成績再與家人溝通，或許爭取到他們支持的機會能大大增加。切記：「家人永遠是你人生的最大避風港」。

過去筆者曾到訪許多大學授課或參加不同的創業活動，有學生經常問：如何才能尋找到可以與自己產生「化學反應」的合作夥伴，從而建立起一支具有凝聚力的創業團隊呢？猶如拍拖找尋另外一半的方法，除了固有的社交圈子外，筆者建議創業者利用互聯網上各種社區平台，參加不同創業活動，例如大專校友會，青年組織及創業社群，主動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最後，如果您認為自己想得很透徹，具有創業的條件，便應該馬上付之實現，畢竟青春有限。